

性别、职业流动与农民工失范感

范艳萍 王毅杰

内容提要 利用2014年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本文描述了农民工失范感现状,并从职业流动的视角探讨了失范感影响因素及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农民工失范感比较强烈,女性更为突出;失范感取决于主观职业流动,而非客观职业流动,同时无论是主观的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对男性有负向作用,而对女性的影响没有通过检验,这部分支持了职业流动分离性假说。在今后研究中,性别差异的分析不仅可从社会角色的视角切入,还需与职业地位与流动等因素结合起来考虑。

关键词 农民工 失范感 职业流动 性别差异

范艳萍,河海大学法学院讲师 210098

王毅杰,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10098

在当前中国,随着新旧体制的相互碰撞,新旧共享价值的交替、重塑,以及阶层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动,社会中失范现象越来越多,反映在社会成员的认知和心理层面便是一种无章可循的迷茫状态——失范感。

身处急剧变迁的社会,每个人身上都会留下社会变迁的痕迹。对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他们还经历着从一个同质性较强的乡村社会进入一个异质性较强的城市社会的转变。在生活节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都迥异于乡村的城市社会,农民工更是强烈地体验着社会转型带给他们的种种冲击。同时,由于性别角色影响,农民工对社会失范的体验也存在性别差异。本文探讨的便是,两性农民工的失范感及其差异,这对促进该群体的心态平衡与城市融合具有现实意义。

一、失范:理论演化与现实启示

失范(anomie或anomia)源自希腊语,它在16世纪的神学指不守法。随着中世纪的结束,失范在17世纪晚期基本上不使用了,到了19世纪,又出现在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迪奥(Jean Marie Guyau)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研究”(12CSH015)、“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同社会群体间社会距离及其弥合机制研究”(15CSH006)和江苏省社科基金“农民工群体心态与社会管理研究”(13SHB006)支持。

的作品中。迪奥把失范理解为一种有创造力的新生事物,一种对僵化观念的挑战与反叛,是道德独立的形式。他在论及道德失范和宗教失范的关系时说:“我们在论述理想的道德时,道德的失范是一种成文的、稳定的、统一的规则的消失。我们更为坚信的是:在宗教领域,理想的宗教应该是一种宗教失范,也就是个人的自由解放。……宗教失范还要消灭在任何伪装之下的教条形式。在伦理学领域,道德失范就是要消除对道德符号的一种遵从、顺从。”^[1]

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迪奥的作品中发现失范的概念,但二者对失范的理解却大相径庭。渠敬东把涂尔干失范理论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当社会剧变时,集体意识所规定的社会界限不断被突破,个人欲望超出了道德意识所允许的范围,整个社会呈现出价值真空;第二、失范是一种反常现象,是一种社会病态;第三,失范意味着社会在个体意识上的不充分在场^[2]。可以看出,涂尔干的失范是对道德的一种否定,而不是道德的另外一种形式。

在涂尔干之后的几十年里,失范概念成为一个“弃儿”,直到美国社会学者重新拾起。美国失范理论有两股主要思潮:默顿关于失范的社会结构方面的讨论和索罗尔关于失范的心理学特征方面的讨论。默顿(Robert King Merton)认为,失范研究的目的是将偏差行为的社会和文化根源揭示出来。失范的根源就是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的张力结构,失范仅是指文化目标与制度性手段的不平衡,而且仅指过于强调文化目标的这样一种不平衡。1964年默顿对失范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可以采用不同术语将个体失范状态与社会失范状态区分开,anomie指社会系统的匮乏状态,而anomia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个体所具有的特殊状态。Anomie不仅是anomia的简单集合,还是anomia产生的前提和条件,是社会的贫困状态^[3]。

索罗尔(L.Srole)不太关心文化结构,他比较关注个体层面上的失范特点。索罗尔认为个体层面的失范可以由社会失范来解释,但是前者可以产生后者。在此基础上,他发展出一套anomia量表:①个体感觉领导对个人需要漠不关心;②个体感到社会变化无常;③感觉离生活目标越来越远而不是逐步得以实现;④个体是否感到生活毫无意义;⑤相信一个人不能从他人那里得到支持^[4]。这是“对一种在经验上行之有效的失范的解说,使得它的解释重点从失范的结构性因素转向了心理环境对个体的态度和条件影响。”^[5]

从迪奥、涂尔干到默顿再到索罗尔,对失范的讨论经历了由抽象到具体、由理解性概念到可测量指标的过程,呈现一种越来越少理论评价,越来越多经验模型的发展趋势,这有力推动了它在现实研究中的应用^[6]。本研究中,我们将沿着索罗尔的路径探讨农民工失范问题,相应地,失范感指的是人们的一种无所适从、迷茫、疏离、颓废以及无规范和混乱的主观感受^[7]。

二、失范感的测量与现状

失范被认为是一个“中层概念”,可应用于多种情景和层次的分析,关键是如何合理地说明它。前文提到了索罗尔的失范量表,涉及以下几类问题:悲观、无意义和变化无常、缺乏道德感等。除此之

[1]朱力:《变迁之痛: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2][3]渠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5页,第49-52页。

[4]Srole,L.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ertain Corollaries: An Exploratory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56, 21(6): 709-716.

[5]Oru,M. *Anomie: History and Meanings*.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121-130.

[6]朱力:《失范范畴的理论演化》,《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7]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外,代表性的测量工具还有 Dean 的量表和 McClosky&Schaar 的量表。Dean 的失范感量表包含 6 条陈述:①只要达到目的,使用什么手段都可以;②人们的观念变化很大,我担心还能依靠什么;③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可遵循;④我经常怀疑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⑤现今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什么都不肯定;⑥外边流传的宗教那么多,不知道信奉哪一个好^[1]。Mc Closky & Schaar 的量表包含 9 条陈述:①如今什么事情都不确定,好像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②今天缺少的是过去那种持续终生的友谊;③世界一片混乱,人们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变成哪样;④社会变化太快,使我在选择遵循准则时遇到困难;⑤我经常感到父辈坚守的规矩在我们眼前被摧毁了;⑥当今最大问题是人们不再相信任何事;⑦我经常感到笨拙;⑧人们在过去比现在好,因为那时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⑨别人似乎比我容易判断什么是正确的^[2]。

参照上述三位学者的量表,同时结合研究对象特征,我们设计了农民工失范感量表,包含 4 条陈述:①社会变化太快、人们经常不知道明天怎样;②做事情,几乎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可遵循;③对很多社会现象的判断,没有固定标准;④身边很多人经常怀疑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选项为“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越同意则失范感越强,分别赋 4、3、2、1 分。

本文分析对象为 15-55 岁、跨县/区外出务工、且从事非农活动至少半年以上的农业户籍劳动力,包括各种类型的自雇和雇主。此次调查,我们从江苏省选取两所高校(江苏师范大学和苏州科技大学)、安徽省选取一所高校(淮北师范大学);然后,在每所学校选择一、两个社会学或社工专业的班级;再由选中班级内生源地是江苏、安徽和河南的同学本着自愿原则参与调查,并且每名学生最多调查 10 名农民工,以保证调查对象的地域覆盖面;最后,让这些学生利用春节假期对返乡农民工进行调查。共发放“2014 城乡居民社会调查”问卷 1031 份,经过严格甄选,有效问卷 893 份。

首先来看农民工失范感的现状(见表 1)。分析发现,对量表中的每条陈述,农民工回答“同意”(包含非常同意)的比例均超过 60%,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变化太快,人们经常不知道自己明天怎样”(78.3%)、“对很多社会现象的判断,没有固定的标准”(74.9%)、“身边很多人经常怀疑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65%)、“做事情,几乎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可遵循”(60.7%),这表明农民工失范感还是比较强烈的。

为便于总体认识,我们对以上 4 条陈述进行主成分法因子分析,并用方差极大化原则对因子负荷正交旋转,抽取了 1 个因子,命名“失范感”^[3]。然后,将因子值转换为 1-100 之间的分值^[4],分值越大表明失范感越强。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失范感得分为 61.09,处于中等偏高水平。

表 1 农民工的失范感现状(单位:%)

	样本量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社会变化太快,人们经常不知道自己明天怎样	882	18.4	59.9	19.2	2.6
做事情,几乎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可遵循	882	12.1	48.6	34.2	5.0
对很多社会现象的判断,没有固定的标准	880	15.8	59.1	22.5	2.6
身边很多人经常怀疑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881	13.6	51.4	32.9	2.0

三、职业流动与农民工失范感

对于失范感的形成有两种解释路径,一是心理学主义,秉持还原论立场,将集体心理还原到个体

[1]Dean,D.G. Alienation: Its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1: 753-758.
[2]McClosky H, Schaar J H.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A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5: 14-40.
[3]累计方差解释率为 49.21%, Alpha 值为 0.654。
[4]转换后因子值=(因子值+B)*A。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

心理加以解释,关心性格、特质、婚姻等个性特征的影响;二是社会学主义,秉持结构论和突生论立场,关注社会关系与结构、文化及社会分层与流动等的影响。

职业地位与流动是社会学主义的重要方面,也是本研究的基本分析路径。职业地位与失范感之间的关系已有过探讨,但个体职业地位的变化也可能会影响失范感,即“职业流动的效应”^[1]。当前,职业地位流动对失范感的影响主要有独立性/分离性假设(dissociative hypothesis)、地位下降假设(falling from Grace hypothesis)、文化同化假设(acculturation hypothesis)三种假说,且每种假说都假定职业地位或流动是失范感的原因,而非结果^[2]。其中,分离性假说认为职业流动对个体心理体验有直接的因果效应,它独立于初始地位和当前地位的效应。据此假说,职业地位的任何改变,不管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都会带来心理不适^[3]。而地位下降假说认为,只有代内向下流动对失范感有影响,尤其在对经济成功抱有高期望的社会^[4]。最近的一些研究证实了地位下降假说,如一项研究发现抑郁症与从充分就业到不充分就业的流动有关^[5]。另一项研究也表明,失去农庄并被迫接受更低地位工作的农民,更易遭受心理困扰^[6]。文化同化假设认为,心理困扰和幸福感与职业流动没有关系,而与个体初始地位或当前地位有关,这一假设也得到部分研究证实^[7]。

以上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启示,同时,我们进一步区分了客观职业流动和主观职业流动以全面考察职业流动对失范感的影响^[8]。此外,根据以往研究,本研究还将性别、世代、婚姻状况、教育经历、社会距离、心理授权作为控制变量^[9]。

[1]Blau,P.M. Social Mobi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56, 21(3): 290-295;Sorokin, P. A. *Social and Cultural Mobility*. Glencoe, IL:Free Press,1959,.

[2]Houle,J.N.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Intragenerational Social Class Mobili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1, 40(3): 757-772.

[3]Sorokin, P.A.. *Social and Cultural Mobility*.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9.

[4]Newman, K.S.. *Falling From Grace. Downward Mobility in the Age of Afflu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5]Dooley,D.,J.Prause, K.A.Ham- Rowbottom. Underemployment and Depression: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000: 421-436.

[6]Swisher,R.R.,Jr G.H.Elder,F.O.Lorenz, et al. The Long Arm of the Farm: How An Occupation Structures Exposure and Vulnerability to Stressors Across Role Domain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98: 72-89.

[7]Blau,P.M. Social Mobi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56, 21(3): 290-295; McLeod,J. D.,R.C.Kessler. Socioeconomic Status Differences in Vulnerability to Undesirable Life Event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990: 162-172 ; Turner,R.J., W.R.Avison. Status Variations in Stress Exposure: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search on Rac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Gender.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003: 488-505.

[8]关于客观职业流动变量,问卷设计了被访者第一份职业、目前职业及父亲职业,然后将职业划为下层体力(含农业人员、非技术工)、上层体力(含技术工人、商服人员)和非体力职业(含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等)。关于代际职业流动变量,按职业声望排序的自己职业和父亲职业相减,小于0的记为1,代表代际向下流动;大于0记为2,代表向上流动;等于0记为3,代表未流动。关于代内职业流动变量,将按职业声望排序的现职与初职相减,小于0的记为1,代表代际向下流动;大于0记为2,代表向上流动;等于0记为3,代表未流动。关于主观职业流动变量,问卷设计了“如果把所有职业分为10层,最低层为1,最高层为10。您觉得您的第一份职业属于第几层”,同样询问了目前职业属于第几层,这样将目前主观职业与第一份主观职业相减,小于0的记为1,代表代际向下流动;大于0记为2,代表向上流动;等于0记为3,代表未流动。

[9]关于世代变量,分为“80前”、“80后”、“90后”三类。关于婚姻状况变量,分为已婚和未婚两类。关于教育经历变量,按照受教育地点和家人陪伴分为留守教育、流动教育和非流动非留守教育三类。关于社会距离变量,我们设计了“与您一起聊天、与您一起工作、与您讨论工作问题、与您做朋友”等8道题,然后对8道题进行主成分法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旋转抽取了1个因子,命名为社会距离。关于心理授权变量,笔者参照Spreitzer的四维度量表设计了“我能自己决定完成工作的步骤和方法、我能自己决定如何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我能自己决定我的工作目标、对我来说,我的工作

表2 失范感影响因素的OLS模型

	全样本 B(S.E)	男性样本 B(S.E)	女性样本 B(S.E)
控制变量			
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组)	-2.464! (1.271)		
世代(以90后为参照)			
80后	-2.864! (1.525)	-2.575(2.154)	-2.969(2.154)
80前	-4.991*(2.260)	-6.248*(2.950)	-2.046(3.752)
婚姻状况(以未婚为参照)	-1.904(1.533)	-0.900(2.134)	-2.761(2.244)
教育经历(非流动非留守)			
留守教育	-1.225(1.382)	-0.824(1.916)	-1.233(2.050)
流动教育	2.690(1.988)	2.016(2.618)	4.449(3.198)
社会距离	0.272! (0.163)	0.410*(0.208)	0.004(0.270)
心理授权	-0.074*(0.038)	-0.102*(0.050)	-0.036*(0.059)
社会经济地位			
受教育年限	0.143(0.288)	0.035(0.380)	0.390(0.456)
职业地位(以下层体力为参照)			
上层体力	6.741*** (1.794)	8.456*** (2.447)	2.795(2.767)
非体力	1.941(2.896)	0.686(4.723)	-1.330(3.957)
主观职业地位(以下层为参照)			
中下层	-1.406(1.818)	-1.676(2.405)	-2.765(2.960)
中层	0.923(1.829)	2.191(2.362)	2.933(3.075)
中上层	-0.203(2.516)	2.489(3.298)	-6.174(4.076)
收入对数	2.155! (1.187)	1.603(1.565)	4.111(1.890)
客观职业流动			
代际职业流动(以未流动为参照)			
向下流动	1.185(1.883)	0.639(2.414)	2.895(3.153)
向上流动	0.967(1.447)	0.130(1.896)	3.834(2.372)
代内职业流动(以未流动为参照)			
向下流动	2.841(1.917)	2.824(2.495)	1.787(3.141)
向上流动	-0.468(1.487)	-1.310(1.996)	2.639(2.333)
主观职业流动			
(以未流动为参照)			
向上流动	3.158** (1.341)	4.000** (1.779)	1.470(2.089)
向下流动	4.825** (2.333)	7.879** (3.399)	-0.388(3.301)
常量	53.689*** (5.418)	50.128*** (7.431)	55025*** (8.292)
调整R ²	0.046	0.062	0.010
N	761	458	303

注: ! p<0.1, *p<0.05, ** p<0.01, *** p<0.001

表2显示,在全样本中,职业地位、收入、主观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失范感有显著影响,而主观职业地位、代际职业流动、代内职业流动无明显作用。

现我们将重点分析职业地位与职业流动对失范感的影响,首先来看职业地位对失范感的影响。全样本模型表明,仅职业地位中的“上层体力”通过检验,且系数为正值。这意味着,上层体力职业的农民工比下层体力职业者的失范感要强烈,而非体力职业和下层体力职业农民工的失范感没有显著差异。

其次,从职业流动来看,不管是代际客观职业流动,还是代内客观职业流动对农民工的失范感都没有显著影响,但主观职业流动的作用明显。与感知未发生职业流动的农民工相比,主观感知到向上流动或向下流动的农民工的失范感更加强烈。Nicklett 和 Burgard 研究了主观阶层流动感知与抑郁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仅感知向下流动的人更可能发生抑郁^[1],而本文发现,不管是主观感知的向上流非常重要”等12道题,然后对12道题进行主成分法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旋转抽取了自主性、意义、影响力和能力4个因子,再将各个公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比例为权数计算综合得分,作为心理授权指标。

[1]Nicklett,E.J., S.A.Burgard.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and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s Among Latino and Asian-American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09, 170(6): 793-801.

动,还是向下流动均对失范感有负向作用。这表明了主观职业流动对失范感有重要影响。主观职业流动,决定了人们的社会态度或行为,并通过再社会化的过程习得新的社会规范,从而做出行为或态度的改变^[1]。

此外,控制变量中的一些结论也值得注意。性别、世代、社会距离、心理授权对失范感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女性农民工比男性的失范感更为明显,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由于二元结构下性别和身份的双重歧视,女性农民工在城市和劳动力市场遭遇更多的冲击和不幸,心理失衡严重^[2];"80前"和"80后"农民工与"90后"相比,失范感要低,因为"90后"农民工所处生活环境与社会背景急剧变化,使得他们在价值观念、心理感受方面不同,再加上他们对城市的期望和现实落差相对较大;农民工感知的社会距离越大,失范感越强。很明显,不友好的社会接纳环境影响农民工的主观体验;心理授权状况越好,农民工的失范感越低,因为好的工作环境能带来积极认知和情感体验。

四、失范感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国内关于失范感的经验研究较少,专门探讨失范感性别差异的更是少见。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李卫东、李树茁分析了农民工失范感的性别差异^[3],但他们主要从角色视角切入,而本研究主要立足职业地位与流动视角。分析结果见表2。

首先,在职业地位方面,职业对男性农民工失范感有显著影响,其中上层体力职业的失范感比下层体力职业的增加8.456个单位;就女性农民工而言,尽管上层职业的失范感比下层体力职业的增加2.975个单位,非体力的减少1.330个单位,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职业对不同性别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这点与李卫东的发现是一致的。

其次,在职业流动方面,主观职业流动对男性农民工失范感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与感知未流动的男性农民工相比,感知向上流动的失范感提高4.000个单位,感知向下流动的提高7.879个单位。与感知未流动的女性农民工相比,感知向上流动的失范感提高1.470个单位,感知向下流动的减少0.388个单位,但并未通过显著检验。这表明主观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失范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最后,在控制变量方面,心理授权对两性农民工失范感的影响机制是一致,而世代、社会距离的作用存在差异。具体来说,无论是男性农民工,还是女性农民工中,心理授权越高,其失范感越弱;男性农民工中,"80前"农民工与"90后"的相比,他们的失范感会减少6.248个单位,而世代对女性农民工没有显著影响;男性农民工中,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大,失范感越强烈,前者每增加一个单位,失范感就会增加0.410个单位,而对女性农民工无明显作用。

从上述数据中,我们认为,以上性别差异的可能原因是:性别角色分工的不同,男性在养家糊口方面需要承担更多责任,而女性的工作往往被看做是次要的、贴补家用的。进而,在遭遇影响自身发展及生活质量的职业流动时,男性感受到的心理压力要大些,如果再感受到这种职业流动是向下的,就更容易体验到社会的无序。而对女性农民工而言,她们角色定位与期待来自家庭而非工作,在这种状况下,即使发生职业流动,相较而言,感受到的心理压力也会较少。也就是说,性别研究不能仅考虑不同性别角色分工,还应结合他们的职业地位与职业流动等因素来进行综合分析。

[1]王甫勤:《社会流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吗?》,〔北京〕《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

[2]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任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3]李卫东、李树茁:《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研究》,〔上海〕《社会》2013年第3期;李卫东、李树茁、权小娟:《性别失衡背景下未婚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研究》,〔北京〕《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6期。

五、结 论

利用2014年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本研究分析了两性农民工的失范感及影响因素差异,有如下发现:

第一,失范是变迁社会中的必然现象,由于发展阶段性和身份特殊性,农民工失范感还是比较强烈的,也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农民工的失范感表现更为明显。这与西方对失范感性别差异的研究一致^[1]。但与前述李卫东的研究相反,其原因这可能与他们的调查对象是未婚农民工有关,该研究分析的重点是这些未婚群体的生命历程——性别失衡下的婚姻挤压。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是职业地位及流动,而这正是农民工的最重要特性之一。

第二,职业对失范感影响的探讨不能停留于个体所处的职业地位,还应关注职业地位改变的影响,即职业流动的效应。职业地位和主观职业流动(不管是感知的向上流动还是感知的向下流动)均对男性农民工失范感有负向作用,但客观职业流动影响不显著。这提示我们,性别研究不仅可从社会角色的视角切入,还需要与社会分层、阶层流动等因素结合起来综合考虑。

第三,流动特征与体验始终是农民工的关键标识,它同样构成影响失范感的重要变量。对于农民工而言,除了他们需要在工作与生活中顺应城市社会节奏与社会剧烈变迁,他们在迁入地的美好经历(比如心理授权^[2]高、社会距离^[3]低)有利于降低失范感。

农民工是社会转型中失范感较强的一个社会群体。结合本研究发现,我们认为可从以下方面降低农民工的失范感:第一,通过规避和防范措施,比如建立共享价值体系、提升就业能力、完善高覆盖保障体系、营造自主尊重环境与氛围,减少社会变迁和城乡流动带来的心理冲击;第二,加强调控和干预手段,比如社区心理教育、咨询服务,来增强心理和谐和社会适应。

纵观已有成果,我们发现对包括失范感在内的社会心态研究多是在理论层面或现象描述层面,而缺少基于经验调查资料的量的描述,进而分析群际差异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尤其是结合社会剧烈变迁这一宏观背景下个体层面的社会位置变迁来进行探讨。应该说,本研究仅仅是个初步尝试,我们期待将农民工的失范感等社会心态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从而探究社会巨变对微观个体影响的差异。

[责任编辑:方心清]

[1]Denton,M.,S. Prus,V.Walters. Gender Differences in Health: a Canadian Study of The Psychosocial, Structural and Behaviour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4, 58(12): 2585-2600.

[2]王开庆、王毅杰:《组织公平、社会支持与农民工心理授权研究》,〔兰州〕《西北人口》2012年第6期;王毅杰、栗治强:《农民工权能感的影响因素分析》,〔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3]王毅杰、王开庆:《流动农民与市民间社会距离研究》,〔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王毅杰、茆农非:《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